

呼和浩特街头“行乞”儿童揭秘——

父母带孩子街头行乞 如何保护孩子尊严

青少年维权岗

青晓英 本报记者 李玉波 实习生 黄丹玮

一名妇女、一个孩子；或一名妇女、两个孩子，这样的“标配”，在6岁的童童(化名)眼中，就是“行乞江湖”。

“跟妈妈出去一个月，我就可以有雪糕吃、有新衣服穿。”童童说，从未吃过的零食、各式各样的衣服都诱惑着她。7月17日，在母亲和8岁姐姐的带领下，6岁的童童步入“行乞”行列，她来自甘肃省岷县。

半个月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新华广场等繁华地段，一群乞讨的小孩异常活跃，看到有行人经过就伸出手去，更有甚者抱着行人的腿，直到行人掏出钱包拿出钞票，才肯松手。童童就在其中。

8月11日，呼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岗勤大队经过摸排，将行乞的一行10人(大人4人、小孩6人)带回询问。据岗勤大队教导员李百岐介绍，他们均来自甘肃省岷县，彼此熟悉。其中不少是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行乞”。6名乞讨儿童中，最小的仅6岁，最大的12岁。而他们的母亲，最大的40岁，最小的29岁。

经调查，7月17日，他们乘坐银川至呼和浩特市的火车到达包头，又辗转从包头抵达呼和浩特市，开始了为期一个月左右的“乞讨生活”，她们已购买了8月19日回家的车票。

在童童看来，外出乞讨就像父母外出打工一样。

今年开春，父亲将家中的3亩旱地种上土豆和黄芪后，便外出找了份开车的工作。7月初，上学前班的童童放假，用8天的时间写完作业后，在母亲刘美芬的亲戚张玲梅的带领下，和母亲及姐姐芳芳(化名)北上“淘金”。

从家里出来后，童童一行人坐火车来到包头，又从包头搭车来到呼和浩特市。懵懵懂懂的童童被母亲牵着，在张玲梅的指引下，一行5人来到呼和浩特市复兴巷一间平房内。“大人5元、小孩2元(每日的房租)”，与房东讨价还价后，刘美芬3人和张玲梅母女，正式入住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南房中。

隔天一大早，童童就被母亲刘美芬叫醒，吃过母亲做的面后，童童便跟着母亲徒步来到新华广场附近。“看到有年轻的叔叔或阿姨，就上去问他(她)要钱，记住没？”在姐姐芳芳和母亲的耳提面命下，又因又累的童童正式“上岗”。

“叔叔给点钱……”芳芳率先出击，在顺利拿到1元后，胆怯的童童被母亲推向前。学着姐姐的样子，童童开始向行人要钱。“姐姐给我点钱吧！”“叔叔给点钱……”年幼的童童博得了路人的同情，5毛、1块、2块……不到一个小时，童童顺利将10元收

入囊中，收获颇丰的童童获得一根雪糕的奖励。就这样，在零食的诱惑下，童童开始了行乞之路。

在“同行”敏敏(化名)的眼中，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去玩的童童有些“不务正业”。

12岁的敏敏与童童有着相同的背景，同样来自甘肃岷县，父母均务农。不同的是，敏敏已有4年的行乞经验，他曾到过湖南长沙、江苏溧阳、江苏泰州，“夏天放假时出去一趟，冬天过完年出去一趟。”一年中，两次外出乞讨，可以支付敏敏一年的学费、生活费等各项杂费。

“一开始我也不敢，但看到别的孩子都能要上钱，我也不怕了。”曾经胆小的敏敏现在成为“头领”，领着4个孩子穿梭在中山西路商业街繁华地段。

“有时候一天能要到100多元，一次，一个人给了我50(元)。”4年的行乞经验，让敏敏找到不少窍门，“穿着时髦的男的、一男一女同行的、带着孩子的母亲、外国人，跟他们要的话一般都会给”。

看着敏敏每天都是要到钱最多的，童童有些羡慕。在一起陪伴行乞的途中，作为“过来人”，敏敏不时提醒童童，“认真点，要不一会儿你妈不给你吃饭，有人不给就抱他的腿”。在敏敏“言传身教”下，童童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内，摆放着两张床，这是童童一家三口，还有婶婶、妹妹的栖身之所。中山西路、新华大街是童童和妈妈、姐姐每天的活动“轨迹”。“每天有方便面、火腿肠、八宝粥吃，还有小朋友陪我玩”，童童说她喜欢这样的生活。

在明亮广场上班的田女士告诉本报记者，她每天上下班都会途经地下通道，这些孩子每天都在此要钱，大概有半个月了。这些乞讨儿童备受关注，很多热心人士希望能救助这些可怜的孩子。

“最小的孩子也就5-6岁的样子，穿着干净，不像是流浪人员。刚开始时，我都会给他一两块钱，还跟他聊天，询问他家里的情况，但孩子好像并不愿意多说。”田女士称。

“我曾怀疑他们是职业乞讨者，这些孩

子可能是‘租来’的。”田女士告诉记者，她曾多次报警，希望公安机关尽快调查。接到报警后，回民区中山西路派出所民警两次赶到现场，把这些乞讨儿童及监护人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进行调查。

“主要是摸排孩子是否存在被拐卖的情况，其次是否存在教唆未成年人行乞的行为。”岗勤大队教导员李百岐表示。

经警方调查，经过抽血化验、户籍比对，证实这些孩子和妇女确实是母子(女)关系，不存在拐卖的情况，因为是亲生子女，所以教唆未成年人行乞的行为也不成立。

究竟有没有法律保障童童这类行乞儿童的尊严？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呼和浩分所主任彭彪律师向记者分析，目前我国法律中没有专门的规制未成年人行乞行为的。“对乞讨的未成年人，其解决办法和管制手段仍然同成年人混杂在一起。救助办法代替收容遣送制度后，对未成年人乞讨者和成年乞讨者‘不加区别’地一律实行自愿救助。没有立法的支撑，执法者纵有救人之心，却

也底气不足。”他说。

此类尴尬已经出现。前述警方透露，童童的父母等乞讨人员被送往救助站后，很快离开了。他们认为，尽管救助站不愁吃喝，但他们带孩子乞讨是为了“挣学费”。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皮艺军向记者进一步分析，家长唆使未成年人行乞，已侵犯了孩子的人格权。“家长不能将小孩当成私有财产而随意处置。当孩子个人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国家的公权力可以进行干涉。”在皮艺军看来，我国的法律应当细化，针对未成年人行乞应有专门的规定，要明确具体到最终处置的每一环节。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100万至150万个流浪乞讨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的背后大多存在被拐卖、被暴力强迫、被操纵控制等数种性质恶劣的犯罪行为。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甄砚曾表示，应严厉打击强迫儿童乞讨



北京单双号限行首日 路面车辆减少

8月20日，北京，民警在单双号实施首日路面检查违法情况。

邓学海：缉毒精英、维和尖兵 是从菜鸟新兵炼成的

法政先锋

本报记者 田文生

走在人群里，皮肤黝黑、中等个子的邓学海，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一般毫不起眼。很难有人会相信，这位36岁的青年曾是缉毒界首屈一指的传奇人物，曾先后两次获得一等功、两次获得二等功、四次获得三等功。

1997年，邓学海梦想成真，在初中毕业外出打工一年后，幸运地被选入军营。这名农家子弟出身贫寒，12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苦难让他比同龄的孩子更懂事，特别能吃苦。

入伍第二年，他来到云南边防总队木康边境检查站，这是中国缉毒界成绩最优、水平最高的几面“红旗”之一，贩毒分子都感叹说“过鬼门关易，过木康难”。早在2001年，就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缉毒先锋站”殊荣。

在这个战功显赫的检查站，踌躇满志的邓学海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第一次上岗查车，就被车撞断了胳膊；当晚，他在公路边指挥一辆货车到指定场地接受检查，不料，后面又冲过来一辆车，他被夹在两车之间……

一个月后返回岗位，重伤初愈的他执拗地拒绝了领导让他去后勤班的好意，“来这，就是要查车、就是要缉毒！”

可是，这年时年19岁的“菜鸟小兵”却延续着“霉运”，很多同来的战友都查到了毒品，崭露头角甚至立功受奖，他却连一克毒品也没查到。

是努力不够？还是运气差？自认为“比谁都能吃苦”的邓学海想不出一道。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高标准要求自己，即使再苦再累，也每天坚持把查毒的心得体会写入缉毒日记，“毒品害人害己！一定不能让毒品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过。”

终于，1999年4月12日，邓学海当兵整一年之际，他查到了1400克海洛因。这个盼了一年的“战果”却让他又隐隐有些失落：“我在查那个毒贩时，他的手不停地抖，他藏毒的手段也不高明，没有惊心动魄，也没有斗智斗勇，所以就成惊鸿一瞥。”

他随后很快查获了很多起案件，自信心越来越强，升上了班长，成长为一名有高度责任感和出色业务能力的缉毒战士，等待着与最狡猾的贩毒分子进行高水平的较量。

2000年6月2日14时40分，一场足以记入缉毒史的经典大案没有任何先兆地到来了。某石油公司的一辆油罐运输车来到检查站，邓学海进行例行检查。

邓学海敬礼：“师傅，车里拉的什么？”“工业酒精。”对方回答得很从容。邓学海接过发货单看了一下，是在边境小城芒市装的工业酒精，“酒精装满了吗？”

“装得满满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司机领着他爬上了车的顶部，拧开盖子查看。“这些货运往哪里？”“昆明。”

“昆明哪个厂？”“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修理厂。”“具体在什么街道什么路？”“记不清了。”

尽管司机依旧面不改色，但对送达的具体地点说不清楚，让邓学海感到其中必有隐情。他心里更大的问号在于：载重10吨的油罐车已经装满，重量却只有7.56吨，车体的容量明显不够，那么，除了酒精，会不会还装了什么呢？

邓学海找来一把锤子，围着车体四周敲打起来，仔细聆听车罐发出的回声。经过反复敲打，他发现油罐前端一米左右处，回声声响有所不同：其他地方回声沉闷，这里回声响亮空洞。他发现了问题。虽然油罐车已经装

的行为，至于怎样才能有效打击、怎样才能有效救助、是不是建立一个失踪儿童信息库、是不是建立一个儿童DNA数据库，现在20个部委正在协调，组成调研组研讨此问题，高度重视强迫儿童乞讨这一严重的社会现象。“希望能尽快解决，儿童优先是一个原则，孩子不能等待，他们正在成长。”

记者查询发现，针对父母利用未成年子女乞讨的情况，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已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父母利用未成年子女乞讨情形时，经公安机关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部门三次以上批评教育拒不改正，严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学习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在发达国家，由相关政府部门负责提起公诉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当然，在提起诉讼前后，都不存在抚养孩子的困难，因为政府有各种救助机构。当前我们法院不敢轻易受理类似案件的现实问题在于，真的撤销监护人资格后，谁来养孩子？”庄瑞彪表示。

“如果要罚款，弱势群体哪儿来的钱？如果要拘留，那孩子的住处又成了问题。”皮艺军道出了法院处理未成年人行乞案件时的窘境。他因此建议，法律应当明确责任主体来专责处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民间公益组织也可加大介入的力量。

451部法规之下，“奇葩”盲道仍屡见不鲜——

无障碍设施的“障碍”在哪儿

实习生 黄丹玮 本报记者 王帝

17年过去了，原中国女子体操队的桑兰仍旧没能实现她游遍全国的梦想。

自1998年在第四届美国友好运动会的练习中不慎受伤后，不幸高位截瘫的桑兰常年依靠轮椅。“考虑到目前国内种种因相关设施不全而带来的麻烦，迟迟没敢动身。”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她的烦恼，也是我国8500万残疾人士的痛处。而这，也是政府在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

8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三周年新闻发布会。会上称，自2012年8月《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至今，我国实现了无障碍建设从无专项条例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转变。

然而，面对着无障碍设施老化、建设不到位、管理不健全等现状，舆论纷纷质疑：无障碍设施建设的障碍到底在哪儿？为何多部法规仍旧管理不好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无障碍设施成摆设，残疾人没法“说走就走”

近年来，我国对于无障碍设施建设愈加重视。

据中国残联于今年年初发布的《2014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共有1506万个市、县、区系统开展了无障碍建设，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4906次，无障碍培训4万余人次。

然而，现实并不乐观。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屡屡被网民调侃为“样子工程”的盲

道。

青海西宁一名刘姓盲人平时就很少出门。“我出门经常被盲道上的障碍物绊倒，或者走着走着就不知走到了哪儿。”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就一个盲人的感觉而言，“街上的盲道多处是陷阱”，还是待在家比较安全。

纵观全国，类似“无障碍设施反成障碍”的现象屡见不鲜。2012年年底，山西太原恒山路百米盲道的35处Z字转弯成了网络热议点，曲折的盲道和笔直的人行道成了鲜明对比，被多数网民调侃“独具特色”。今年7月，北京海淀区羊坊店路东侧的一条盲道引起了社会关注，700米长的盲道上有40多个拐弯儿，而有的弯儿还呈90度转折。盲道不“帮盲”，甚至还帮了倒忙的事情并不少见。不少人质疑：盲道究竟是修给盲人走的，还是用来装饰道路的？

不帮忙的，不只是盲道。据一些热心读者向本报反映，全国多地多处建有无障碍设施，有时却成了摆设。

家住武汉汉口常年依靠轮椅出行的庄女士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武汉地铁虽然设有残疾人扶梯，但基本不开，她乘坐地铁时只能由家人将人和轮椅一齐抬下楼，“冬天穿衣服比较多，家人都很不方便，夏天常热得满头大汗”。庄阿姨说，家楼下居民区的无障碍通道基本停满了私家车，很多时候她只能摇着轮椅绕远道而行。

家住北京大兴区的刘先生也有相似感受。他腿部残疾，行动不便，“每次去医院我都需要经过一个天桥，天桥是几年前修的，也安装了无障碍电梯，但始终就没见运行过，我们残疾人上不去不去冒着风险过马路”。

记者采访中还了解到，无障碍设施被挪作他用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平日由家人推轮椅带着出行的山西太原刘女士，家附近的大商场原本设有无障碍通道，而近日，通道被商铺占用了。“看着被堵住的无障碍通道，我的心像砌了一堵墙”。

更让一些残疾人寒心的是，明明有无障碍设施，却没有很好地使用。

“公交车上明明设有方便残疾人的滑

坡，而大多数司机却对我的轮椅视而不见。”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安徽一名因车祸受伤而靠轮椅出行的姜先生，心里总是不忘是滋味儿。

桑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可以明显感受到近几年来中国无障碍环境的改善，但她仍感觉“如果没有人帮助自己，依然没办法出行”。

忽略使用者需求，善意成巨大浪费

前述发布会通报，截至2014年，全国共出台了451个省、地、市、县级无障碍建设与管理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然而，在400多部法规作用下，我国无障碍设施依然面临着“覆盖面不全”“设施老化”“建设不到位”“管理不健全”等诸多障碍。

全国无障碍建设专家委员李斌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国家虽然制定了400多部法律，但执行的效果还差了点儿，距满足残障人士的需求还存在着一定距离。”

“十一五”期间，全国共有100个城市参与创建无障碍城市。而据现状看，收效并不明显。同济大学教授李克平提示，相关部门不能抱着“按政策修建好无障碍设施就大功告成”的态度。“因为无障碍设施的修建、使用、维护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三者缺一不可，需要不断跟进和完善”。

而对于让人啼笑皆非的“特色盲道”现象，李克平认为：“修建无障碍设施，却忽略使用人群的真实需求，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他说，无障碍设施的修建应避免形式主义、表面功夫，不能仅仅按政策来机械实行，满足使用对象的切身需求，才是政策法规制定的初衷。

对于那些被占用的无障碍设施，桑兰认为，完善罚则是关键。

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桑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起了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在美国，需要在车内悬挂主治医生开具的证明，才能停在无障碍停车位上，不然将面临高额罚款。而当无障碍设施无故停用的时候，当地居民也可以起诉至司法机关，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手段来解决。”桑兰说。

无障碍环境，获益的不单是残疾人

在无障碍设施上设置障碍的，不单是政府一方。

尽管政府一直在呼吁无障碍环境建设，但相关设施被挪作他用、被损坏甚至无视的现象却成常态。相关专家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社会大众。

“人们常常容易将残疾人边缘化。”在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白艳莉看来，社会大众缺乏对残疾人群体发自内心的理解，这也是400多部法规管不好无障碍设施建设的重要原因。“无障碍环境建设不能单靠政府‘一厢情愿’，社会也需要发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对残疾人进行帮扶。”白艳莉表示。

白艳莉呼吁，我们的教育应从幼儿园开始就告诉孩子人人平等，要关爱弱势群体，学会如何与之相处并尊重他们的诉求。“这些货运往哪里？”“昆明。”

“昆明哪个厂？”“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修理厂。”“具体在什么街道什么路？”“记不清了。”

尽管司机依旧面不改色，但对送达的具体地点说不清楚，让邓学海感到其中必有隐情。他心里更大的问号在于：载重10吨的油罐车已经装满，重量却只有7.56吨，车体的容量明显不够，那么，除了酒精，会不会还装了什么呢？

邓学海找来一把锤子，围着车体四周敲打起来，仔细聆听车罐发出的回声。经过反复敲打，他发现油罐前端一米左右处，回声声响有所不同：其他地方回声沉闷，这里回声响亮空洞。他发现了问题。虽然油罐车已经装

公告 本公司旗下产品“美拍”APP中的鬼畜特效包中若干背景音乐素材来自网络。经本公司多方查找，无法找到相关音乐素材的权利人，故发此公告。请相关权利人知悉后尽快与本公司联系，本公司将依法支付相应报酬。 厦门美国之家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1日